

## 敦煌殘卷「觀音證驗賦」與永明延壽

成功大學中文系 王翠玲

### 摘要

永明延壽(904—975)的撰述中，與觀音菩薩明確相關的有「觀音靈驗賦」一道、「觀音禮讚文」一卷等。此外，他曾於晚年的974年為吳越王錢俶以殮刊印二萬幅「十二面二十四應現觀音像」，並於每日的宗教生活中，實行了包括十件與觀音信仰有關的佛事，又在其主要著作之中，也多有語及觀音菩薩之處。敦煌殘卷的「觀音證驗賦」之名稱，雖不同於延壽的撰作「觀音靈驗賦」，但對於延壽的該賦作之名稱，自古以來即有數種說法。筆者在綜合了中國文學史上的賦體撰述・僧侶的著作情況・觀音信仰的靈驗記類著作以及延壽的觀音信仰等情況之後，推測現今為上海圖書館藏的作者佚名之殘卷「觀音證驗賦」極可能即是延壽所撰述的佚失千年的「觀音靈驗賦」。

**關鍵字：**永明延壽 觀音信仰 觀音靈驗賦 觀音證驗賦 十二面二十四應現觀音像

## The Fragments of Dunhuang of Guan-yin-zheng-yan-fu and Yong-ming Yan-shou

Wang Tsui-L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Abstract

Amid the writings of Yong-ming Yan-shou (永明延壽, 904-975A.D.),

Guan-yin-ling-yan-fu (觀音靈驗賦) and Guan-yin-li-zan-wen (觀音禮讚文) are Related to Guan-yin Buddhisattva. And yet, in his later years (974A.D.), he printed twenty thousand silky sheets of “the statue of Guan-yin, have on 12 faces and showing 24 kinds of miraculous transformations” (十二面二十四應現觀音像) for Quin-cu (錢俶), the king of Wu-yue (吳越). Besides, he also mentioned Guan-yin Buddhisattva among his major writings (e.g. Zong-jing-lu, Wang-shan-tong-gui-ji, Xin-fu-zhu etc.). Although the name of the fragments of Dunhuang of Guan-yin-zheng-yan-fu (觀音證驗賦) is different from Guan-yin-ling-yan-fu (觀音靈驗賦) that belongs to Yan-shou’s work.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the name of Guan-yin-ling-yan-fu (觀音靈驗賦) in many books. Namely, the name of that fu(賦) appeared several ways of speaking from long ago. By generalizing the style of fu appearing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monk’s works, the writings of miraculous story about the Guan-yin’s faith, and Yan-shou’s belief in Guan-yin, I suppose that Guan-yin-zheng-yan-fu (觀音證驗賦) which author’s name is unknown and is housing in Shanghai library now is Yan-shou’s Guan-yin-ling-yan-fu (觀音靈驗賦).

**Key word:** Yong-ming Yan-shou, Guan-yin, Guan-yin-zheng-yan-fu, Guan-yin-ling-yan-fu, “the statue of Guan-yin, have on 12 faces and showing 24 kinds of miraculous transformations”.

# 敦煌殘卷「觀音證驗賦」與永明延壽

成功大學中文系 王翠玲

## 一、前言

敦煌寫本中出現了殘卷「觀音證驗賦」，這並非是單純的偶然事件，因為對觀音菩薩的信仰在中國源遠流長，早自四、五世紀以來，就已成為苦難民眾心目中的救星。觀音的慈悲、靈驗事蹟更是口碑相傳、家喻戶曉，所以從六朝時代即有眾多有關祂的冥報記、靈驗記、應驗記等之作傳世。但是，雖有各種記述性文字傳世，然而以「賦」之文體傳述觀音菩薩的靈驗事蹟者，據筆者管見，僅見一人一文，而且依各種現有典據加以判斷，筆者認為此賦之作者可能是五代十國時期生存於吳越國的永明延壽（904—975）。以下，筆者即依下列五大項目：（1）賦與縉流作家、（2）本殘卷的現況、（3）本殘卷與觀音信仰、（4）吳越國的觀音信仰、（5）本殘卷與永明延壽，加以論述。

## 二、「賦」與縉流作家

「賦」之文體，自以漢賦為著，然賦雖為兩漢時代的代表性文體，歷朝累代亦不乏賦體之作，故六朝駢賦、唐代律賦、晚唐五代的俗賦等亦各占有一席之地。相對於此，縉流作家雖代有其人，而從事賦作者卻不多見。其實縉流作家除了對三藏典籍作注疏之外，外典式的藝文性著作也在在可見，而且其中所運用的文體也相當豐富，例：若依『全唐文』卷 903—922 所載，僧人的撰述計有序、表、書、記、論議、啟、碑文、疏奏、狀、傳、銘、贊、誥、賦等，但其中「賦」體僅於該書卷 922 錄有晚唐五代時期的二篇，而該二篇賦作正是永明延壽的「金剛證驗賦」及「法華瑞應賦」<sup>1</sup>。這雖僅是『全唐文』的收錄狀況，但由此亦可看出僧侶的賦作確實寥寥可數。儘管如此，縉流作家之賦作仍時而可得其一二。如：晉支曇詒（？-411）著有「廬山賦」、「赴火蛾賦」<sup>2</sup>，而陳真觀（538—611）則有「愁賦」<sup>3</sup>、「夢賦」之作<sup>4</sup>，此外尚有梁仙城慧命（531-568）之「詳玄賦」<sup>5</sup>。

<sup>1</sup> 『全唐文』卷 922，台南：經緯書局，1965 年出版，頁 12122—12123。

<sup>2</sup> 收錄於唐 歐陽詢編纂的『藝文類聚』卷 7 及卷 97。

<sup>3</sup> 見載於唐 道宣『續高僧傳』卷 30，『大正藏』第 50 冊，頁 703 中一下。

<sup>4</sup> 見載於唐 道宣編著的『廣弘明集』卷 29，『大正藏』第 52 冊，頁 341 中—342 中。

<sup>5</sup> 見載於『廣弘明集』卷 29，『大正藏』第 52 冊，頁 340 上一下。

相對於縑流作家的絕少運用賦體創作，五代十國時期生存於吳越國的永明延壽（904—975）的賦體作品可謂相當豐富，這可由詳載其著作目錄的『智覺禪師自行錄』得知。該書中所載永明延壽的賦作計有七篇，其名如下：1.愁賦，2.華嚴感通賦，3.觀音靈驗賦，4.神棲安養賦，5.心賦，6.金剛證驗賦，7.法華瑞應賦<sup>6</sup>。而其中之6、7兩賦如上所述，乃收錄於『全唐文』卷922中，至於5.「心賦」，現存於永明延壽自撰自注的『心賦註』中，4.「神棲安養賦」則全文收錄於『樂邦文類』卷5之中<sup>7</sup>，而其餘諸賦則蹤跡杳然。

### 三、本殘卷的現況

關於本殘卷「觀音證驗賦」的現況，筆者擬由其書目的記載情況談起。本殘卷「觀音證驗賦」，目前收錄在上海圖書館（館藏號812555），但是對於此殘卷的書寫年代，卻有不同的意見。例如最早登錄此殘卷於其目錄的李盛鐸氏（1858—1937）即視之為唐代寫本<sup>8</sup>。然而吳織 胡群耘合撰而發表於1986年的「上海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續）」一文則疑之為宋代的寫本。二氏之原文如下：

「143 南北朝及唐人寫經殘卷十三種（館藏號812555）」

題簽：敦煌本晉唐寫經十三種

卷內：1、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八十四……

14、觀音證驗賦

宋寫本（？）

賦文共8行，行17、18字不等。

說明：本卷前三行似為書信之尾部，賦從第四行始。」（頁90—91）

<sup>9</sup>。

藉由此一記載，我們可以知道本殘卷係與其他殘卷共同收錄，而且賦文本身只剩八行，並於賦文之前有類似書信的三行文字。至於有關本殘卷的最新概況，則來自於現今收藏本殘卷的上海圖書館，據該館出版的「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

<sup>6</sup> 見載於『智覺禪師自行錄』，『卍續藏』111冊，頁166下。但『釋門正統』卷8則僅言及「著五賦」（『卍續藏』130，頁899下—900上），也就是說，其中並未提起1.「愁賦」和5.「心賦」之二篇賦作。

<sup>7</sup> 「神棲安養賦」之全文係與進呈於吳越忠懿王的「進安養賦奉制文」一起收錄於宋代宗曉的『樂邦文類』卷5中，參考『大正藏』第47冊，頁214下—215上。

<sup>8</sup> 「李木齋舊藏敦煌名目錄」（第一部分）中記載為「散0592 唐寫本觀音證驗賦（共八行）」，詳見黃永武主編『敦煌叢刊初集』第二冊，頁325，台北：新文豐，1985年6月初版。但並未見載於李氏之『木樨齋藏書題記及書錄』。

<sup>9</sup> 吳織 胡群耘合撰而發表於1986年的「上海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續）」，『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頁90—91。

獻、附錄、敘錄」所載，殘卷的詳細情況如下述：

「14 觀音證驗賦（上圖 105〈812555〉）

宋寫 卷子

白色薄皮紙，半紙。首尾殘缺。23.2cm，寬 20.4 cm，卷心高 20.6 cm，天頭 0.8 cm，地腳 1.8 cm。存 11 行，每行 17 至 18 字。烏絲欄<sup>10</sup>。楷書，墨色濃<sup>11</sup>。

首三行似書簡尾部，後為『觀音證驗賦』。本號『上圖目』編號 143。」<sup>12</sup>

此一記載包括了殘卷的尺寸大小、紙質、現存行數，以及每行的字數，和『觀音證驗賦』的部分內容等，由此可知此殘卷的形式當屬於正式的形式<sup>13</sup>。由於筆者無緣目睹實物，所以對於文中所述的「薄皮紙」，心存疑問。這是因為此一紙質的敘述並不清楚，當非麻紙，而可能為「由拳（藤）紙」，「溫州蠟紙」也說不定<sup>14</sup>。

#### 四、本殘卷與觀音信仰

觀音信仰在中國的流傳由來以久，早自兩晉南北朝時期開始，隨著諸經典的漢譯，如『法華經』「普門品」<sup>15</sup>、東晉竺難提譯『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經』（419 年以後譯出）、北涼曇無讖譯『悲華經』（419 年譯出）、唐菩提流志譯

<sup>10</sup> 關於「烏絲欄」，根據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論』所言，乃「用縑帛來寫書，縑帛上也用筆畫或絲線織成邊欄界行。黑色的稱為 烏絲欄，紅色的稱為 朱絲欄。紙書行用以後仍畫有邊欄界行，敦煌遺書中大部分都畫有欄線，且幾乎都是黑色，習慣上仍的稱為 烏絲欄。」（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 年 11 月一版一刷）

<sup>11</sup> 吳其昱撰，伊藤美重子日譯「敦煌漢文寫本概觀」中云：「敦煌寫本的大多數是卷子本，文字以黑墨書寫，大致是從東晉時代一直到宋初（五—十世紀）的六百年間所書寫者。其中以九，十世紀的寫本最多，東晉南北朝時代所書寫者非常少。隋以前的書法稍帶隸體，隋唐之後成了楷書，一般而言並不難分別，而可以運用在書寫年代的判定上。通常，儒釋道的經典和正式文書是用楷書、注疏和非正式的文書則用行書，草書則極少見。」（筆者中譯）參見『講座敦煌 5 敦煌漢文文獻』頁 17，東京：大東，1994 年初版。

<sup>12</sup> 「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 附錄 敘錄」，收錄於『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第四冊，頁 21，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9 年九月一版一刷。

<sup>13</sup> 藤枝晃氏在其『敦煌學及其周邊』一書中，嘗言及所謂正規的形式，是指在天地一尺的麻紙上，專門的寫經生以正式的楷書，每行寫十七字，而製成的卷子本。參考同書頁 37，大阪：難波塾出版，1999 年 12 月。

<sup>14</sup> 參考張秀民『五代吳越國的印刷』，『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頁 69 及頁 74 之注 4 及注 5，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 年一版一刷。其中言及吳越王錢氏書籍多用「由拳紙」書寫（頁 69），又說「溫州出蠟紙，潔白緊滑」（同上），此一記載令人想起「白色薄皮紙」之說，故筆者個人作出此猜測之見。

<sup>15</sup> 『法華經』傳有六譯，今存三譯，最通用者為後秦鳩摩羅什於弘始八年（406 年）譯出者，最早的是竺法護的初譯，其譯出年代為晉太康七年（286 年），而「現存觀音傳說最早有年代記載的一個是『光世音應驗記』裏關於竺長舒的，事情發生在晉太康年間（291—299 年）。就是說，距『法華經』的譯出僅十年左右的時間。」（孫昌武『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頁 136，北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

『不空統索經』(707—709年間譯出)等<sup>16</sup>，對觀音菩薩的崇拜與造像、稱誦名號大為盛行<sup>17</sup>。再加上時難世艱，能因應眾生的現世利益需要的觀音菩薩，更成了救苦救難的代表<sup>18</sup>，而它的慈悲與神通能力也在偽經的製作及宣講其事蹟的諸多靈驗故事中<sup>19</sup>，再三得到印證，於是觀音信仰的流行彷彿風行草偃般地不可抑止。而觀音菩薩像的印施，在唐、五代時期變得相當盛行，也有相當多的遺品流傳至今，如：署名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944—974)彫造的「觀世音菩薩像」，曹元忠夫人於乾德六年(968年)繪製的「觀世音菩薩像」，彫造者不詳的「聖觀自在菩薩普施供養受持」圖，「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圖<sup>20</sup>。但是大規模而且精美地印製觀音菩薩像的明確記載，仍應為吳越忠懿王錢俶(947年12月—978年5月在位)，然而錢俶其實並非吳越國五主中唯一的觀音信仰者，早在其祖父錢鏐(852—932)時期即已開始信奉觀音菩薩了。以下簡單介紹吳越國的觀音信仰概況。

## 五、吳越王國的觀音信仰概況

吳越王國的觀音信仰肇始於開國君主的錢鏐(896—932年3月在位)，據明釋廣寶撰『天竺志』卷一「靈威錄」所載，他曾夜夢觀音菩薩告以「汝有心慈悲，不忍殺人，將屏藩一方，百戰不。中原天子雖易五姓，汝之疆土，固自若也。福祿遐永，子孫綿遠，珪組蟬聯，封王拜相，莫可涯涘，二十餘年，當覓我於天竺山中。鏐覺而異之，自是所向無前，隨有神功，種種響應，若合左券。故書之於策，昭示子孫，世世崇祀」<sup>21</sup>(下線乃筆者所加)。順帶提及，上文中所云之杭州「天竺山」，在宋代以後是僅次於普陀山，而與陝西的南五臺山、河南的大香山等相提並稱的觀音菩薩聖地<sup>22</sup>。

除此之外，錢鏐在位期間的同光元年(923年)，浙江鹽官(今海寧)居民曾

<sup>16</sup> 此四經在『宗鏡錄』中皆可見到其引用文，如『悲華經』見諸『宗鏡錄』卷27(『大正藏』48，頁568下)，由此可見永明延壽對此四部經典的內容相當熟悉。

<sup>17</sup> 參考：松本文三郎「觀音的語義與古代印度 中國的觀音信仰」，收錄於『佛教史雜考』，大阪：創元社，1944年初版。

<sup>18</sup> 參考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三冊，頁566—567，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12月三刷。

<sup>19</sup> 參見牧田諦亮著『六朝古逸觀世音應驗記的研究』，京都：平樂寺書店，1970年。

<sup>20</sup> 如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後晉開運四(西曆947)年彫造「觀世音菩薩像」，參考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論』頁67，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一版一刷。其餘諸圖請參見周心慧主編『中國古代佛教版畫集』頁21，及同書版畫之頁20、24、25，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年。

<sup>21</sup> 『天竺志』卷一，收錄於『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一輯第26冊，頁30-31，台北：明文出版社，1980年一版。又也可參考萬鈞編『觀音靈異記』頁117—118，台北：新文豐，1999年7月一版二刷。關於此事的可信度，由皮光業的「上天竺觀音看經院感應碑」可獲得證明，請參閱『天竺志』卷二，同上頁55—56。

<sup>22</sup> 參考佐伯富「近世中國的觀音信仰」，收錄於『塚本善隆博士頌壽記念 佛教史學論集』頁373(京都：塚本善隆博士頌壽記念委員會，1961年)。釋印光「石印普陀山志序」，王亨彥輯『普陀洛迦新志』頁7(台北：新文豐，1975年11月初版)。

於波浪間得栴檀所成的觀音古像，遂由吳越王迎請入府，後奉安於龍山圓覺精舍，靈異甚著<sup>23</sup>。

錢鏐之後繼位的文穆王錢元瓘（932—941 年在位）執政期間的石晉高祖天福四年（939）杭州天竺山沙門道翊嘗獲奇木，遂命匠人孔仁謙以之作觀音像<sup>24</sup>。而同年（即天福四年，939 年）錢元瓘本人則曾經下令於天竺山造觀音殿宇<sup>25</sup>。

即使錢鏐、錢元瓘父子都信仰觀音菩薩，但在吳越王國的君主中，最熱心的觀音信奉者，仍非最後的統治者忠懿王錢俶莫屬（947 年 12 月—978 年 5 月在位），他在位期間，一則於乾祐二年（後漢隱帝，949 年）於石屋洞鑿觀自在菩薩像一軀，並親自撰述了「乾祐鑿佛贊」61 字，且用小行書摩崖<sup>26</sup>。

再則於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時，求禱於觀音大士，乃獲得「袍笏冠冕無算」的指示，而決心向宋太祖上表獻物稱賀<sup>27</sup>。此外，錢俶也曾經印製了兩萬幅「十二面觀音二十四應現」絹像<sup>28</sup>。而一件以原作為範本的日本僧侶玄證的複製品至今仍保存於日本京都大學久原文庫，並公諸於『大正藏』圖像部中<sup>29</sup>。雖然這絹像中並未明言印製的年代，但由其避宋諱，去除「弘」字而署名「天下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印造」來看<sup>30</sup>，可知當在吳越國的晚期，即西曆 960 年之後<sup>31</sup>。

<sup>23</sup> 楊傑「泛海觀音記」，『大覺國師外集』卷 11，頁 6—7，韓國建國大學，1974 年影印海印寺拓本。但筆者未得見原文，此係由黃啟江氏之作得知（參考：『北宋佛教史論稿』，台北：商務，1997 年，頁 208）。又，楊傑『無為集』中未登載此文（參考：『四庫全書』集部 38，台北：台灣商務）。

<sup>24</sup> 參考：宋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 80，宋 志磐『佛祖統紀』卷 42（『大正藏』49，頁 391 下）。明 釋廣寶撰『天竺志』卷三，頁 86。明 郎瑛『七修類稿』卷 47「天竺觀音」，頁 574（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 年一版一刷）。清 杭世駿『訂訛類編』頁 529—5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一版一刷）。牧田諦亮『五代宗教史研究』頁 83（京都：平樂寺書店，1971 年）。

<sup>25</sup> 參考：諸葛計 銀玉珍編『吳越史事編年』頁 244（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年）。

<sup>26</sup> 錢俶「乾祐鑿佛贊」，清 陳鴻墀纂『全唐文紀事』卷 106，頁 130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一版一刷）。又，關於此事，鄭僧一氏所撰『觀音——半個亞洲的信仰』一書中，誤信李圓淨編『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并圖之說』（即普門品圖證十四版，上海，1937 年，40b 頁），認為乃錢元瓘所為，且謂該贊為「觀音撰辭 62 字」，見鄭書之頁 30，注 26（台北：慧炬出版社，1987 年 5 月初版）。

<sup>27</sup> 參考：『天竺志』卷一「宋太祖建隆元年」條，頁 32-33。也可參考：萬鈞編『觀音靈異記』頁 119（台北：新文豐，1999 年 7 月一版二刷）。

<sup>28</sup> 參考張秀民「五代吳越國的印刷」，『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頁 70 及頁 72（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 年）。此外復有「兩千幅」之說，請參閱趙永東「五代時期雕版印刷事業的發展」，『文史』44，頁 162 - 163（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9 月）。

<sup>29</sup> 參考：『大正藏』圖像部第六卷，頁 26—27（別紙四）。其中云：「應現觀音（玄證本），一紙，京都帝國大學久原文庫藏本」。又可參考：王國維「晉開運刻毘沙門天王像跋」（『觀堂集林』下冊，頁 846，石家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11 月一版一刷），趙永東「五代時期雕版印刷事業的發展」（『文史』44，頁 162 - 163，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9 月）。此外復請參閱周心慧主編『中國古代佛教版畫集』第一冊，頁 23。

<sup>30</sup> 吳越國王之官銜，在五代時期屢有更迭，其中所謂「天下（兵馬）大元帥」之銜，可見諸『宋史』及『咸淳臨安志』。例：元 脫脫『宋史』卷 480，列傳 239「世家三 吳越錢氏」文中云：「建隆元年，授天下兵馬大元帥」，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6 月新一版，頁 13897。此外諸葛計 銀玉珍合編的『吳越史事編年』頁 330 云：「建隆元年，3 月，乙巳（初六日），錢弘俶更名俶。弘俶以名犯趙匡胤父弘殷諱，故去弘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年。

<sup>31</sup> 趙永東[1998、09]「五代時期雕版印刷事業的發展」，『文史』44 輯，頁 151—170，北京：中華

吳越國內除了忠懿王錢俶自身之外，民間亦有鑄觀音菩薩像並製贊者，如清、阮元『兩浙金石志』卷4中所載之「後漢朱知家鑄觀音菩薩像贊」，即為後漢隱帝乾祐三年（950年）在石屋洞摩崖者<sup>32</sup>。綜合上述，可知永明延壽身處的吳越國是觀音信仰極盛行之地區，所以不論是君王或士庶，對觀音菩薩都尊信有加，而永明延壽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也不能不受影響。

上述之外，關於「十二面觀音二十四應現」絹像，猶有許多值得探究之處。這是因為「十一面觀音」<sup>33</sup>的造像形式有包括正中央的本面而共成十一面的，也有共成十二面的兩大類型。即使如此，明言為「十二面觀音」者卻不多見，而且在論述觀音菩薩的信仰或造型的相關論文、書籍中皆極罕見提及；此外，觀音菩薩的化身應現，一般常提起者為三十三化身（此係依「普門品」）或三十二應身（依『楞嚴經』卷六），而罕見「二十四應現」。且在「二十四應現」中，除了第一的「觀自在現」和第十三的「觀水月現」是常見的造型之外，其餘的多屬非人的造型，如寶光、寶樓閣、吉祥草、金鼓等，皆可謂是絕無僅有的表現。所以若由這點來看的話，我們可以說，吳越國的觀音信仰極為特殊。

還有應注意的是，「十二面觀音」與「十一面觀音」相較，雖僅有一面之別，但兩者在藝術表現上卻全然不同，如「十一面觀音」在儀軌上的規定為：正面的三面為菩薩面（寂靜相），左三面為瞋面（忿怒相），右三面則作菩薩面而狗牙上出（利牙上出相），後一面為笑怒面（暴惡大笑相），頂上為佛面（如來相）。而吳越國的「十二面觀音二十四應現」像則作第一排三面、第二排四面、第三排四面、最頂端一面之四層式配列；並擁有六臂，而「二十四應現」則採用對稱式的配列方法，分列在觀音像的左右兩邊。然後再於圖像的下方詳述二十四種應現之具體名稱，以及觀音所說之各種神咒，最後一行則署名錢俶印造。由此可見，此圖像絕非僅供藝術鑑賞之用，而是能作為供養、膜拜及實行宗教儀式之用。

另外，關於「十二面觀音」與寶誌和尚的關係，根據現有的相關資料而言，我們可以說是到了宋代時期才將二者連繫起來的。關於「十二面觀音」此一詞語，早可見載於唐代臨濟義玄（？—866）的『臨濟錄』<sup>34</sup>，以及五代時期南唐靜、筠

書局。文中頁162—163云「日本久原文庫還藏有日僧玄證所摹錢俶印造的觀音應現像，中畫觀音菩薩，其手中蓮華與足下蓮座旁注有赤字，為印成後所加，旁畫二十四種應現，下錄真言，共二十四行，末署天下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印造。王國維曾見此摹本，謂以摹本度之，原本刻畫頗極工緻。此經未注明刻印年款，但從錢俶署名避宋牒來看，可知在吳越晚期。」筆者案：所謂「王國維曾見此摹本云云」之說，見王氏「晉開運刻毘沙門天王像跋」之文，收錄於『觀堂別集』卷3（『觀堂集林』下冊，頁846）。

<sup>32</sup> 清阮元『兩浙金石志』卷4，收錄於『石刻史料新編』第14冊，頁10277上（台北：新文豐，1979年）。

<sup>33</sup> 有關「十一面觀音」的佛典有1 570年左右的耶舍崛多譯『十一面觀世音神經』一卷，2 654年左右的阿地瞿多譯『十一面觀世音神經』一卷，3 656年左右玄奘譯的『十一面神心經』一卷，4 746—770年左右不空譯的『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儀軌經』三卷等。

<sup>34</sup> 參考『大正藏』47，頁504上。但是此中有版本上的問題，如：明代續藏本的『四家語錄』中所

二師編撰的『祖堂集』(952年成書)<sup>35</sup>。然而其中皆尚未見到將「十二面觀音」與南朝齊梁間的神異僧寶誌(或作寶志、保誌,生年有多種說法,卒年則同為514年)結合起來而予論述的情況。但是隨著時代的遷移,至宋代時,中國方面的記載,例如:志磐『佛祖統紀』(1269年成書)已多視寶誌和尚與「十二面觀音」有關了<sup>36</sup>。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中國方面的記載,日本的入唐僧們,如慈覺大師圓仁(794—864)『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2、宗性抄錄『日本高僧傳要文抄』卷3「延曆僧錄」等所記載的卻是「十一面觀音」而非「十二面觀音」<sup>37</sup>,此中之差異誠耐人尋味。由上述可知,正處於唐、宋之際的五代時期吳越忠懿王錢俶出資刊印的「十二面觀音像」圖<sup>38</sup>,對於連繫「十二面觀音」與寶誌和尚的關係,似有無形的推波助瀾之功。

## 六、本殘卷與永明延壽

關於本段落,筆者擬由三點論述,即1.賦文與首三行書信之內容概觀,2.永明延壽作品中的觀音信仰,3.本殘卷與永明延壽的關係。首先關於第1點,即本殘卷之詳細內容,根據張錫厚編『敦煌賦彙』所載翻刻文如下<sup>39</sup>:

「披誦之餘,更仰該明之德。已令來年正月於寺建金剛道場一會。故茲獎諭,想宜知悉。遺書指不多及。」(頁337—338。但分行係筆者根據『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第四冊頁21所錄原文而為。下線乃筆者所加。

收錄的「鎮州臨濟惠照禪師語錄」中並未收錄(京都:中文出版社,1983年12月再版)。

<sup>35</sup> 南唐的靜、筠二師編撰、張華點校『祖堂集』卷二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一版一刷)。

<sup>36</sup> 參考:宋志磐『佛祖統紀』卷36及卷37(『大正藏』49,頁346下、頁348下)。『佛祖統紀』之記事後為元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卷10,元覺岸輯『釋氏稽古略』卷2所繼承。特別是誌公變十二面觀音的畫像已成為宋代時期寺院畫像、壁畫的題材之一,這方面的相關記載,請參考松本榮一『敦煌畫的研究 圖像篇』(京都:同朋社,1985年復刻初版)。

<sup>37</sup> 牧田諦亮「寶誌和尚傳考」中云「在圓仁的記錄上,視寶誌為十一面觀音化身的是開成五年(840年)的事。」(京都『東方學報』第26冊,頁79,1966年3月)。另外,「延曆僧錄」中記載大安戒明(770—780年入唐)「復禮拜志公宅,兼請得志公十一面觀世音菩薩真身,還聖朝。於大安寺南塔院中堂素影供養。」(『大日本佛教全書』101冊)。柯毓賢[1988]「五公菩薩源流與觀音信仰」,『東方宗教研究』2,頁128(台北:文殊出版社)。

<sup>38</sup> 參見永明延壽『心賦注』及元照重編的『永明知覺禪師方丈實錄』合刊的宋代善本書,但筆者未見原文,此乃根據張秀民「五代吳越國的印刷」之說。張氏之原文如下:「應現觀音像畫二十四種應現,下錄真言二十四行。末云:天下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印造。錢王賜錢千貫,用絹素印二萬本。現在只有日僧玄澄摹本。」(參見『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頁73,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年一版一刷。又筆者案:張氏文中的「玄澄」乃「玄證」之誤)。

<sup>39</sup> 「觀音證驗賦」,張錫厚編『敦煌賦彙』頁336-339(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二刷,1996年5月一版)。

又，筆者案：此即所謂「首三行」之雜文或非賦文的內容)。

而所謂「賦文八行」之翻刻文則如下述：

「觀音證驗賦 寶陀大士，本幽深，廓十方而為願海，指萬彙而作慈心。見影聞名，降祉而洪鐘待扣；標心舉意，應機而虛谷傳音。爾乃雲暗藏身，賊驚馳走；逾獄解縛，脫枷卸杻；玄功罕測，得神力而添螿；慈濟難思，辯方言而換首；其或臨刑不死，身挂枝頭；現師子而奔馳惡獸，化童兒而引過驚流。施藥洗腸，愈沈痾之極苦；風滅火，脫危難之深憂；鼠傳瘡而去病」(頁 337。但分行係筆者根據『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第四冊頁 21 所錄原文而為)。

首三行之書信文中，有「令」及「獎諭」之辭，此等皆為上對下時的用語，特別是「獎諭」之辭係君王對臣下褒獎、表彰之用語<sup>40</sup>，而且在確為錢俶所撰的「進安養奉制文」中，亦有全同於此三行書信中的用語，那就是「故茲獎諭，想宜知悉。遺書指不多及」(『大正藏』47，頁 215 上)，因此，筆者認為本書信當係忠懿王寫給永明延壽的書函。

此外復有「金剛道場一會」之語句，想係誦讀『金剛經』之法會。『金剛經』自後秦時代由鳩摩羅什譯出以來，於南北朝時期即有傳為傅大士(497—569)撰述的夾頌一卷(乃敦煌寫本)，而陳隋之際也有天臺宗的智顛(538—597)為之作疏一卷，其後三論宗的吉藏(549—623)為作疏四卷，法相宗的開祖窺基(632—682)作述贊二卷、會釋三卷，華嚴宗智儼作略疏二卷，華嚴宗五祖宗密(780—841)也撰疏論纂要二卷<sup>41</sup>，以及敦煌出土文獻中眾多的唐代撰述的『金剛經』疏<sup>42</sup>，此外尚有唐玄宗的『御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完成於開元 23 年，西曆 735 年之前)<sup>43</sup>，由此可知『金剛經』不僅早已受到中國佛教各宗派祖師的注意，連貴為帝王的唐玄宗也為之作注，而這種帝王為佛典作注的例子，在中國佛教史上極為罕見，由此可見得此經之盛行於中國，仍應以唐代為其開端。唐代當時除了有窺基、

<sup>40</sup> 參見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縮印本)上卷，頁 1400 (1997 年 4 月)。

<sup>41</sup> 上述諸『金剛經』疏多收錄於『大正藏』第 33 及第 85 卷。

<sup>42</sup> 參考：平井宥慶「敦煌文書中的金剛經疏」(收錄於『新羅佛教研究』，東京：山喜房，1975 年)等相關論文。

<sup>43</sup> 唐玄宗的『御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現存於 1.『房山石經』刻石(參考吳夢麟「房山石經本『唐玄宗御注金剛經』錄文」，『世界宗教研究』1982 年第二期)，2.敦煌本，見唐道氤『御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參見『大正藏』第 85 卷，伯 2113、伯 2132、伯 2173、伯 2330、伯 3080，斯 1389、斯 2671、斯 4052、斯 5905 等)，參考平井宥慶「敦煌文書中的金剛經疏」頁 541—542)。

宗密等大師為之作注疏之外，尚有孟獻忠、蕭瑀、段承式等人編纂持誦『金剛經』的靈驗記類的作品<sup>44</sup>，以及在中國印刷史上極著名的印刷精美的唐咸通九年（868年）本的『金剛經』印行等事。至於『金剛經』廣汎風行於中國之原因，一說與禪宗（特別是南宗禪）有關<sup>45</sup>，一說則謂與本經典的延命、滅罪、救護等利益有關，而永明延壽所撰述的「金剛證驗賦」中，也以「云何唄」作為受持『金剛經』可獲得延命利益的根據<sup>46</sup>。姑且不論『金剛經』在中國盛行的真正原因為何，其盛行之年代仍應以唐代為始。

永明延壽「金剛證驗賦」的撰述想係與『金剛經』的信仰及實踐所得的靈驗有關，此外在永明延壽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延壽禪師與『金剛經』的淵源也頗深<sup>47</sup>，因為他除了在其著作中運用經中的語句及思想內容之外，也在實踐層面上身體力行。例如在『智覺禪師自行錄』所載永明延壽的百八佛事中之第五十二事為「後夜普為一切法界眾生旋繞念金剛經心中心陀羅尼，普願證金剛三昧堅固佛身，真言曰，唵烏倫尼薩婆訶」（『卍續藏』111，頁159），由此一記載，可知除了熟稔運用『金剛經』的教理之外，永明延壽禪師也注重念誦「金剛經心中心陀羅尼」。而此「金剛經心中心陀羅尼」在敦煌文獻的伯希和本第2094號『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中的「開元皇帝讚金剛經功德」偈文、啟請八大金剛、大身真言等等之後已言及之，並云「凡人至心誦此真言者，猶誦天下藏經一遍也」（『大正藏』85，頁160上）。由其中透露出來的消息，吾人可知永明延壽與『金剛經』的關係是既有典籍上的理解，也有修行上的自我要求，更有修行後所得的證驗。換句話說，也就是信解行證具足，所以永明延壽對『金剛經』的信仰必然是堅定無比。

又關於錢俶出資印觀音像之事，若根據張秀民氏「五代吳越國的印刷」之說，則乃「錢王賜錢千貫，用絹素印二萬本」者。但遺憾的是現在原本不傳，只存有

<sup>44</sup> 例：615年左右的蕭瑀著『金剛般若經靈驗記』十八條、718年孟獻忠撰有『金剛般若經集驗記』三卷（收錄於『卍續藏』149冊）、段承式編纂『金剛經鳩異』（收錄於『卍續藏』149冊，及『西陽雜俎』續集卷七），盧求『金剛經報應記』三卷，此外尚有撰於唐天復八年的作者不詳而現收錄於『大正藏』85冊的『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而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中更是收錄了與『金剛般若經』有關的靈驗故事共計七卷一百零三篇，由此可知從隋唐時代開始，與『金剛經』有關的靈驗故事已盛行於世。

<sup>45</sup> 例：敦煌本『六祖壇經』特別重視『金剛經』，此外六祖慧能的弟子神會的著作中亦多『金剛經』的內容。

<sup>46</sup> 參考高橋佳典「唐代的『金剛經』信仰與延命祈願」，『宗教研究』315號，頁239—241，1998年3月，日本宗教學會。筆者案：但是『全唐文』卷922所載之「金剛證驗賦」中並未見到與「云何唄」有關的內容，或係『永樂大典』卷7543所收錄者。此外『中國學術名著』第四輯『類書叢編』第一集第100冊中也記載「子釋家金剛證驗賦一篇宋釋延壽撰述吳興周子美影印本」。

<sup>47</sup> 例『宗鏡錄』的卷2、卷3、卷14等多處皆引用了『金剛經』的內容，參見『大正藏』48卷，頁427下，頁430上，頁489中等。

日僧玄證的摹本<sup>48</sup>。出資者為吳越王錢俶，而主事者則為永明延壽。此說同樣亦見載於張秀民氏之文章中，其中張氏謂：

「永明延壽很重視文字圖像的宣傳，計他刊印的有：  
 彌陀塔圖 親手印十四萬本。……  
 二十四應現觀音像 甲戌（公元 974 年）開板，用絹素印二萬本」<sup>49</sup>。

張氏之說的根據係來自出版於 1160 年合刊的宋本『心賦注』及元照重編的『永明知覺禪師方丈實錄』，而此二書合刊的善本書現藏於北京圖書館<sup>50</sup>。

此外，關於 2. 永明延壽與觀音菩薩、觀音信仰的關係，可由延壽自己的著作及記載他的傳記中尋得蛛絲馬跡。例：

（1）宋 宗鑑集『釋門正統』（紀元 1237 年）卷 8 記載永明延壽有「觀音應驗賦」一語（『卍續藏』130 冊，頁 899 上）。

（2）『智覺禪師自行錄』（以下略稱為『自行錄』）記載永明延壽的著作有「觀音靈驗賦」一道，「觀音禮讚文」一卷（『卍續藏』111 冊，頁 166）。

（3）南宋 宗曉編『法華經顯應錄』卷上中記載為「觀音現神〔賦〕」（『大藏新纂卍續藏經』78 卷，頁 23 下）。

上述的三項記載都表明了永明延壽確實撰有與觀音菩薩的靈驗事蹟有關的賦作及禮讚文，雖然各書對於該賦文所記載的名稱並不一致，但是不論是「應驗」或是「靈驗」、「現神」，其意義皆近似於「證驗」，所以它們與敦煌殘卷「觀音證驗賦」的關係值得注意。此外，以記載永明延壽每日力行實踐一百零八件佛事知名的『自行錄』中，亦列舉了數件延壽每日必然實施的與觀音信仰、觀音法門有關的修行事蹟。例如：

【1】『自行錄』百八佛事中之第七事為「每日常誦般若心經八卷，普為法界八苦眾生離苦解脫」（『卍續藏』111 冊，頁 155 上）。

【2】『自行錄』百八佛事中之第九事為「常六時誦千手千眼大悲陀羅尼，普為一切法界懺六根所造一切障」（『卍續藏』111，頁 155 下）。

【3】『自行錄』百八佛事中之第二十四事為「旋繞念觀世音本身陀羅尼，普願具圓通身，成普門行，真言曰，唵悉羅毘婆尼薩訶」（『卍續藏』111 冊，頁 157）。

【4】『自行錄』百八佛事中之第二十七事為「午時普為一切法界眾生頂戴觀音行道，成觀音實際之身，運同體大悲之行」（『卍續藏』111 冊，頁 157）。

<sup>48</sup> 參見『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頁 73（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 年一版一刷）。

<sup>49</sup> 參見『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頁 72。由刊印年代的 974 年來看，可知「二十四應現觀音像」的印刷乃永明延壽（975 年示寂）最晚年的事蹟之一。

<sup>50</sup> 見『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子部）』，頁 1612，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無出版年代）。

【5】『自行錄』百八佛事中之第三十事為「黃昏禮同學法侶寶陀洛山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摩訶薩，盡十方法界一切菩薩摩訶薩，普願法界一切眾生入圓通門，運法界行」(『卍續藏』111冊，頁158)。

【6】『自行錄』百八佛事中之第三十三事為「黃昏時，普為一切法界眾生旋繞念觀世音菩薩摩訶薩，願具十四無畏，福佑眾生」(『卍續藏』111冊，頁158)。所謂「十四無畏」，係出自『首楞嚴經』卷6，『大正藏』19卷，頁129上一下。

【7】『自行錄』百八佛事中之第三十八事為「初夜普為一切法界眾生旋繞念觀音蓮華心陀羅尼，普願具大悲門自在慧。真言曰，唵阿盧勒繼娑婆訶」(『卍續藏』111冊，頁158)。筆者案：「娑」一作「 」。

此處之「觀音蓮華心陀羅尼」，依其內容而言，可知當係觀自在菩薩所說出的「蓮華部心真言」，而真言的音譯文字，依各譯本而稍有差異(雖譯者同為唐朝的不空三藏)，詳見：

- 1.不空譯『阿郭多羅陀羅尼阿楫力經』，其內容為「觀自在菩薩即說真言曰唵阿楫力迦娑 訶， 此真言是一切蓮華部心，持者生極樂。」(『大正藏』20卷，頁23中)；
- 2.『金剛頂降三世大儀軌法王教中觀自在菩薩心真言一切如來蓮華大曼拏懷』(『大正藏』20卷，頁30下)；
- 3.不空譯『觀自在菩薩心真言一切念誦法』(『大正藏』20卷，頁32中)，而且此三種譯本之真言文字亦無任一譯本全同於永明延壽所持誦者，儘管如此，其音皆極近似。

此外，「十二面觀音二十四應現」圖中亦印有 蓮華部心真言 ，其文字則作「唵阿楫力迦薩婆訶」<sup>51</sup>，可知真言由於係採用音譯，故對於漢譯文字之全同與否並不太在意，只要音近即可。

又，此一真言復可見於敦煌出土五代時期的獨幅彫版「聖觀自在菩薩普施持供養」圖中，該圖中所載之「聖觀自在菩薩蓮華部心真言」為「唵阿輻力迦娑 賀」，參見大屋德城「關於觀世音菩薩的印佛及摺佛」(收錄於『寧樂』13號)。

【8】『自行錄』百八佛事中之第五十事為「後夜禮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無生典，普為一切法界眾生，冥合真心，了無所得」(『卍續藏』111，頁160上)。

【9】『自行錄』百八佛事中之第七十事為「初夜普為盡十方面眾生，擎爐焚香，念般若大悲心陀羅尼，悉願諦了自心，圓明般若。真言曰，怛姪他，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卍續藏』111冊，頁161)。

此處有三事值得注意：

<sup>51</sup> 「十二面觀音二十四應現」圖中的「蓮華部心真言」之具體內容，詳見『大正藏』圖像部第六卷，頁26—27(別紙四)。

1.為永明延壽竟然稱『般若心經』中之真言為「般若大悲心陀羅尼」，若未注意其前之「般若」二字，極易與通稱為「大悲」的「大悲心陀羅尼」相混淆<sup>52</sup>。

2.為永明延壽將『般若心經』中的「即說 曰」一句以「怛姪他」(梵文為 tad yatha)<sup>53</sup>表現出來，這是各『般若心經』譯本中完全未有的狀況。關於『般若心經』各譯本(如玄奘、法月、智慧輪、法成等)的詳細譯文，請參見『大正藏』第八卷之頁 848 以下。

3.此外復有一種可能，即 1.之「般若大悲心陀羅尼」為「般若大心陀羅尼」之誤，因為根據『陀羅尼集經』所載，「般若大心陀羅尼」即由「怛姪他」開始敘述<sup>54</sup>。

不過，比較遺憾的是，筆者未能在永明延壽的相關著作中，搜尋到永明延壽引用『陀羅尼集經』的直接證據，所以此處究竟是 1.或是 3.的情況，尚未能斷言。

【10】『自行錄』百八佛事中之第八十三事為「普為一切法界眾生，晝夜六時，別建道場，供養觀音尊像，六時旋繞，課誦名號，願諸眾生五眼圓明，十身顯現」(『卍續藏』111，頁 163)。

由上述十項相關記載，可知『自行錄』中顯示出來的永明延壽的觀音信仰之來源極多，除了一般熟知的與觀音信仰有關的經典之外，尚有【3】及【4】的『首楞嚴經』<sup>55</sup>，【7】的「觀音蓮華心陀羅尼」，【2】的「大悲心陀羅尼」和【1】、【8】的『般若心經』及【9】的『般若心經』中的真言等。

除了每日力行與觀音菩薩有關的法門之外，永明延壽的著作中也有提及「觀音」，或「觀自在」，「觀世音」菩薩者<sup>56</sup>，如『宗鏡錄』，『萬善同歸集』及『心賦註』。其中『宗鏡錄』中有關觀音菩薩的內容計有(甲)取用自『首楞嚴經』的觀音圓通法門，入流亡所等內容，(乙)引用自『法集經』文的大悲法門，(丙)典據為『請觀音經』的「觀於心脈，使想一處，即見觀世音也」，(丁)『法華經』「普

<sup>52</sup> 「大悲心陀羅尼」之稱，汎見於『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悲心陀羅尼』的經文中，如『大正藏』20 卷，頁 116 上欄第二行，及同頁中欄第七行等。而自宋代四明知禮以來，亦略稱之為「大悲心」。

<sup>53</sup> 「怛姪他」(梵文為 tad yatha)，中文可譯為「也就是說」、「即說 曰」。依 Franklin Edgerton 編著的“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Vol. 1, p.249 左欄之解釋，意為“just as if” (Delhi, 1993 年再版)。而傳統式的解釋則有稱之為「此是劍語」者，如『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悲心陀羅尼』之行間小注(見『大正藏』20 卷，頁 116 中欄第 29 行)。

<sup>54</sup> 參見：『陀羅尼集經』卷三，『大正藏』18 卷，頁 807 中。又，筆者按：「般若大心陀羅尼」中之「怛姪他」之「怛」乃作同音字之「迎」。

<sup>55</sup> 此係由觀音圓通法門和十四無畏可知。參考：唐 般刺蜜帝譯『首楞嚴經』卷六，『大正藏』19，頁 128 中—129 上，其中言及觀世音菩薩的三十二應。筆者案：此應由來自『法華經』「普門品」之 33 化身。

<sup>56</sup> 「觀音」、「觀自在」、「觀世音」等三種名號各有不同的典據，而永明延壽並未刻意區分其中的異同。但是在上述『自行錄』的十則有關觀音菩薩的記事中，言及「觀音」者有三則，言及「觀世音」者也有三則，而「觀自在」之名號則完全未使用。

門品」的稱念觀音名號，(戊)實誌識禪宗初祖達磨是傳佛心印的觀音聖人(卷 97)，(己)「念觀音名號，火不能燒等」(卷 29)，(庚)「闡觀音普門之慧，任方圓」(卷 32)等等。

至於『萬善同歸集』中有關觀音菩薩的內容僅有天臺宗高僧慧成「入觀音道場，證得眾生語言三昧」(卷 1，此則記載也見載於道宣『續高僧傳』卷 16，「惠成傳」，『大正藏』50，頁 557 上。志磐『佛祖統紀』卷 9，『大正藏』49，頁 195 中)一則而已。而這則記事不免令人想起『自行錄』百八佛事中之第八十三事所載的「普為一切法界眾生，晝夜六時，別建道場，供養觀音尊像，六時旋繞，課誦名號，願諸眾生五眼圓明，十身顯現」(『卍續藏』111，頁 163)。

而『心賦註』中有關觀音菩薩的內容則有二則，一則為與『宗鏡錄』相同的『法集經』的大悲法門(卷二)，再一則乃為「觀音是自心之大悲」之說(卷三)。亦即二則內容皆與大悲有關。

由上述諸書的諸說中，我們可以看出 2.永明延壽作品中呈現出來的觀音信仰是，永明延壽既熟知觀音菩薩的靈驗事蹟，也承認觀音菩薩修行的法門主要為耳根圓通，並具有大悲的特性。而這些也都符合現今我們所熟知的觀音菩薩的性格和特徵。除此之外，更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那就是『樂邦文類』卷 3(『大正藏』47 卷，頁 195 上—中)，『法華經顯應錄』卷下(『大藏新纂卍續藏經』78 卷，頁 46 中—下)，『釋門正統』卷 8(『大藏新纂卍續藏經』75 卷，頁 352 上—下)等書中，皆提及永明延壽曾於禪觀中，蒙觀音菩薩甘露灌口，獲得觀音辯才。或許這些記事正可解釋何以『自行錄』中所載永明延壽每日實行的一百零八件佛事中，與觀音菩薩有關者偏多的緣故。

至於 3.本殘卷與永明延壽的關係，開門見山地從結論來說的話，筆者認為本殘卷即是現今失逸的永明延壽之作——即『自行錄』所謂的「觀音靈驗賦一道」，及宋 宗鑑集『釋門正統』(1237 年成書)所載的「觀音應現賦」，南宋 宗曉編『法華經顯應錄』(1198 年成立)所云的「觀音現神賦」。雖然各書所載文章名稱不盡相同，但不論是「靈驗」或是「應現」、「證驗」、「現神」，事實上這些詞語都是指誦經或稱念名號、寫經、造像之後出現的感應或神異經驗而言，因此，中國不僅只在佛教界有這些記載感應或神異經驗的故事，道教裏也有類似的故事集，如唐代著名道士杜光庭(850 - 933)編有『道教靈驗記』。凡此種種，皆可看出自六朝以來，感應或神異、冥報等故事早已植根於中國人的心中，而且並不因時代的推移而稍有衰退，反而此類故事有由『法華經』、『觀音經』擴及『金剛經』等的現象，而且也呈現出跨越宗教間藩籬的情形。

作為支持筆者見解的證據則有上述的永明延壽自撰並自己刊印的『心賦註』中之說，也就是永明延壽曾經獲得吳越王錢俶贊助的千貫錢，而於西元 974 年刊

印「十二面觀音二十四應現像」二萬幅之事。既有刊印之事，為之作賦，以助推廣，是再自然也不過的事了，更何況在手寫仍為書籍的主要流傳方式、印刷術尚未全面盛行的五代時期，這般的以高級的絹一口氣刊印二萬幅的大手筆，又怎能不為文以誌其事呢。更何況永明延壽在『宗鏡錄』卷 29 中也明言念觀音菩薩名號可獲靈驗（『大正藏』48，頁 589 上）。但是有點美中不足的是『觀音證驗賦』文中的用語，除了「寶陀」、「標心」、「本」之外，極少見用於延壽現存的其他作品中。不過，這應不影響結論，因為延壽諸作本身就有各種主題（如『宗鏡錄』以「心」為主題，『心賦註』同樣亦以「心」為主題），也採用各種文體（如詩、歌、訣、賦、文、贊、記等），所以在講究文采，對仗以及音韻的條件上，再加上觀音菩薩的靈驗事蹟的主題限制，確實不易重疊使用相同之語彙，所以這一點反而更可表現出永明延壽的內外學兼通，文才可觀。

## 七、結論

綜合上文所述，我們可看出，即使現存的殘卷中並未見載作者之名，但是不論是從時代、社會、個人等各方面來看，如 1. 賦文的前三行書信文所透露的訊息，2. 宋本『心賦註』等二書之合刊本中的記載，3. 永明延壽所作的關於觀音菩薩靈驗事蹟的賦作名稱，各書之記載本來就略有差異，4. 從永明延壽的著作中所呈現出來的對觀音菩薩的慈悲、靈驗之全盤信賴，凡此種種，在在皆可說明永明延壽很可能即是敦煌殘卷「觀音證驗賦」的作者。